



武士道

日本人的精神

新渡戶稻造 著 張俊彥 譯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根據東京岩波書店“岩波文庫”本1972年版譯出，
翻譯時曾參考東京丁未出版社1905年英文本

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

作 者：新渡戶稻造

譯 者：張俊彥

責任編輯：張宇程

封面設計：涂 慧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14字樓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1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6565 0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VISION

經典閱讀 思想掌舵

置身知識與資訊的汪洋中，讀經典讓我們站穩腳步，不輕易隨波逐流，或被浪淹吞沒，更讓我們配備方向舵及望遠鏡，省思自身，思考當前社會及世界的境況，探究問題本質，啟導未來。

Vision 系列叢書選收社會學、政治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人類學、文學等的經典傳世作品，學習前人思哲，訓練獨立思辨能力，觸類旁通。

假如你仍停留在只聽過經典作品的名稱，或道聽塗說的階段，還沒一窺作者開闊的視野，邀請你一起讀 Vision，讀世界。



關於新渡戶稻造

新渡戶稻造 1862 年出生於日本岩手縣盛岡市，是日本思想家、農學家、教育家。早年於札幌農學校畢業，並在學校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1884 年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深造，後又轉赴德國哈雷—維滕貝格大學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Halle-Wittenberg) 留學，取得博士學位，於 1891 年返日，同年與瑪麗·埃爾金頓 (Mary Elinton) 結婚。

回國後先後任教於札幌農學校、京都大學、東京大學等校。1901 年任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長，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1918 年出任東京女子大學首任校長。1920 年任國際聯盟書記局事務次長，並為日本的學士院會員、貴族院議員。1933 年於加拿大逝世，享年 71 歲。除了《武士道》外，尚著有《農業本論》、《修養》、《自警錄》、《偉大羣像》等書。

新渡戶稻造的名言為“願為太平洋之橋”，他傾注畢生之力，成為日本與各國文化間互相交流的橋樑。其卓越貢獻令人折服，日本政府採用其肖像作為 1984 - 2004 年 5,000 日圓紙幣上的代表人物，以示崇敬與紀念。





《武士道》是新渡戶稻造於 1899 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患病休養期間，為了向外國人介紹日本的傳統武士道而用英文寫成的。作者年幼時曾接受武士道教育，因此，他在介紹時與別的外國日本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身份及態度。作者大量引用西方歷史和文學典故進行比較，使外國讀者能易於閱讀和理解。





譯者前言

本書作者新渡戶稻造（1862-1933），是日本的一位思想家、教育學家。早年畢業於札幌農學校，並在該校接受洗禮，成為一個基督教信徒。1884年他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深造，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又轉赴德國留學，於1891年返日。回國後先後在札幌農學校、京都大學、東京大學等校任教。1918年任東京女子大學第一任校長。後來在1920年又曾任國際聯盟書記局事務次長，並為日本的學士院會員、貴族院議員，1933年客死於加拿大。主要著作除《武士道》外，尚有《農業本論》、《修養》、《自警錄》、《偉大羣像》等書，而以本書最為有名。

《武士道》一書是作者於1899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養病時，有感於外國人對日本的傳統武士道知之甚少，為了向國外介紹而用英文寫成的。由於作者本人是一個在幼年時親自接受過武士道傳統教育的日本人，因此，正如作者所說，他在介紹時，與別的外國的日本研究者至多只不過是個“辯護律師”不同，“可以採取被告人的態度”。的確，我們在讀到他所系統介紹的武士道的種種方面時，頗有入木三分之感。同時，由於作者是為了向國外作介紹而寫的，行文中大量引用了西方的歷史和文學典故進行



比較，所以就更便於外國讀者閱讀和理解。正因為如此，本書一出版就引起了外國讀者的極大興趣。據作者自序說，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不僅自己親自讀了此書，還以此書分贈其友人。光是本書的日本版從 1900 年到 1905 年的 6 年之間就重版了 10 次，本書還被譯成了多種文字，在世界的日本研究書目中佔有重要位置。目前在我國的日本研究正深入到探討日本的文化傳統、民族特性對當代日本的影響之時，相信把這本頗享盛名的著作譯為中文以饗讀者，或許不無意義。自然，由於本書是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前寫出來的，其中有些觀點不免有過時之感，同時，由於作者本人的立場所限，有些觀點也很值得商榷。這是希望讀者們注意的。

中譯本是根據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的岩波文庫中，由矢內原忠雄所譯的日譯本 1972 年第 14 版轉譯的，在翻譯時並參考了東京丁未出版社 1905 年出版的第 10 版增訂版的英文原著。日譯者矢內原忠雄是新渡戶稻造的學生，也是一位著名的日本經濟學家，曾任東京大學校長。日譯本略去的作者為便於外國讀者理解而就一些日本風俗習慣所作的腳註，中譯本都恢復了，又添加了一些我們認為有助於中國讀者了解的譯註。凡中譯者所加註釋，均加“——譯者”字樣，作者原註加“——作者”字樣，未加標註的均為日譯者的註釋。

中文譯文承蒙姜晚成先生細心校閱，多所匡正，謹此





深表謝意。由於譯者的水平所限，譯文有不妥之處，還望
讀者指正。

張俊彥

1990年7月於北大中關園





目 錄

關於新渡戶稻造	ii
譯者前言	iv
日譯者序	ix
初版序	xii
增訂第十版序	xv
緒論	xviii
第一章 作為道德體系的武士道	1
第二章 武士道的淵源	9
第三章 義	17
第四章 勇——敢作敢為、堅忍不拔的 精神	23
第五章 仁——惻隱之心	29
第六章 禮	39
第七章 誠	47
第八章 名譽	55



第九章 忠義	63
第十章 武士的教育和訓練	73
第十一章 克己	79
第十二章 自殺及復仇的制度	85
第十三章 刀——武士之魂	101
第十四章 婦女的教育及其地位	107
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薰陶	121
第十六章 武士道還活着嗎？	129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將來	141





日譯者序

這是先師新渡戶博士所著英文《武士道》的全譯本。博士開始撰述本書是在 1899 年（明治三十二年）因病逗留美國療養的時候，即博士 38 歲那年。同年在美國（費城利茲和比德爾公司）、翌年在日本（裳華房）出版，爾後曾多次再版。在 1905 年（明治三十八年）第十版時，進行增訂，在美國（紐約 G. P. 普特南之子出版社）和日本（丁未出版社）發行。又在博士逝世後的 1935 年（昭和十年）由研究社加上博士遺孀的序言發行了新版。

明治三十二年，是日中甲午戰爭之後 4 年、日俄戰爭之前 5 年，世界對日本的認識還極其幼稚的時代。正在這時，博士在本書中以洋溢的愛國熱情、駭博的學識和雄勁的文筆向世界廣泛宣揚了日本道德的價值，其功績是可與三軍的將帥相匹敵的。本書刺激了世界的輿論，理所當然地被廣泛翻譯成各國文字。誠然，在博士的許多著作中，可以毫不躊躇地稱本書為其代表性傑作。

本書的日文譯本，曾在明治四十一年由櫻井鷗村先生譯出。櫻井先生根據新渡戶博士的親自指教和解釋，曾寫出本書的詳細註釋，而且他的譯文據說是全部經過博士校閱，所以原著中所引用的日文、中文文章或其出處，大體





上可以信賴櫻井先生。我雖盡量親自查核了這些文章，但查核不到的就轉用了櫻井先生譯書中的全部或部分註釋。其他譯詞借助於先生的也不少。

櫻井先生的譯作是非常有名的譯本。但是我之所以敢於嘗試重新翻譯本書的原因是，除了由於櫻井先生的譯本絕版已久不易找到之外，還由於更加缺乏漢文字素養的現代日本人對先生的譯文或恐難以理解，同時也不能說該譯本在內容上就毫無瑕疵。

一般認為原著的英文在文風上深受卡萊爾的影響，有時簡潔雄勁得似乎很生硬，在真摯的行文中夾雜着詼諧和嘲諷，言辭華麗等，對不習慣於此文風的人來說，這決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書。不過，對仔細玩味的讀者說來，卻是足以沁入內心深處的大手筆。我在翻譯的時候，曾試圖多少再現原著文章所具有的這種風格，但是究竟取得幾分成功便有待讀者判斷了。

原著中就日本固有的風俗習慣或一些事物，為外國人所加的腳註（如琵琶、鶯、掛軸、柔道、跪坐、棋盤、雨窗等），我在翻譯時省略了。反之，為便於日本讀者了解，對有關的若干事項卻在正文中作了補充。所有譯者的補充均用六角括號〔〕標出，兼作譯者的註釋。

矢內原忠雄

昭和十三年（1938年）7月於東京自由之丘





謹以這本小書

獻給我所敬愛的叔父太田時敏

他教導了我敬重過去並仰慕武士的德行





初版序

大約十年前，我受到比利時已故著名法學家德·拉維萊先生 (Émile Louis Victor de Laveleye) 的款待，並在他那裏盤桓了幾天。有一天在散步時，我們的話題轉到了宗教問題。“您是說在你們國家的學校裏沒有宗教教育嗎？”這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問道。“沒有”，我這麼一回答，他馬上大吃一驚，突然停下了腳步，又問道：“沒有宗教！那麼你們怎樣進行道德教育呢？”這個問題使我難以忘懷。當時他這一問倒使我楞住了。我對此沒能馬上作出回答。因為我在少年時代所學的道德訓條並不是在學校所教授的。直到我開始對形成是非觀念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之後，我才發現，正是武士道使這些觀念沁入了我的腦海。

我寫這本小書的直接動機，是由於妻子經常問我：這些思想和風俗為甚麼會在日本普遍流行呢？

我試圖給予德·拉維萊先生和妻子滿意的答案。不過，我發現，如果不了解封建制度和武士道，那麼現代日本的道德觀念畢竟仍是一個不解之謎。

正好由於長期臥病被迫終日無所事事，我把家庭談話中對妻子的一些回答整理出來，現在公之於眾。它的內容





主要是我在少年時代，當封建制度還盛行時所受到的教誨和所聽所聞。

一方面有小泉八雲 (Lafcadio Hearn) 和休·費沙夫人 (Mrs. Hugh Fraser)，另一方面又有歐內斯特·薩道義爵士 (Sir Ernest Satow) 和張伯倫教授 (Professor Chamberlain)，我夾在他們之間，要用英文來寫一些有關日本的事，的確使人氣餒。不過，我唯一比這些大名鼎鼎的理論家優勝之處，在於他們只不過是站在律師或檢察官的立場，而我卻可以採取被告的姿態。我經常想，“如果我能有他們那樣的語言天份的話，我將會以更具雄辯的言詞來陳述日本的立場！”但是，用借來的語言來說話的人，如果能使自己所說的意思得到理解，那也就該謝天謝地了。

貫串整部著述，我試圖從歐洲的歷史和文學中，引用類似的事例來說明的論點。因為我相信這會使外國讀者更能理解這些問題。

當我談到宗教或有關傳教士的問題時，即使出現被認為具侮辱性的言詞，我也相信我對基督教本身的態度毋庸置疑。我並非針對基督的教諭本身，而只是不同情教會的做法，以及使基督的教諭變得暗淡的各種形式而已。我相信基督所教導的、並由《新約聖經》所傳留的宗教，以及銘刻於心的律法。我還相信上帝與一切民族和國民——不論是異邦人或猶太人，基督教徒或異教徒——都訂立





了被稱為“舊約”的聖經。至於我對神學的其他看法，就不再贅述了。

在結束這篇序言的時候，我要感謝我的朋友安娜·哈茨霍恩 (Anna C. Hartshorne) 對本書所給予的許多有益建議。

新渡戶稻造

1899年12月於賓夕法尼亞州莫爾文





增訂第十版序

這本小書自從六年前發行初版以來，有着一段預期不到的經歷，其結果是超乎預料的豐富多彩。

日本版已重印了九版。這一版為了提供給全世界英語國家的讀者閱讀，在紐約和倫敦同時發行。直到現在為止，本書已由印度的德夫 (Dev) 先生譯成馬拉地語，由漢堡的考夫曼 (Kaufmann) 小姐譯成德語，由芝加哥的霍拉 (Hora) 先生譯成波希米亞語，由倫貝格¹的“科學與生命協會”譯成波蘭語。正在準備推出挪威語版和法語版，漢語譯本也在籌劃中。再者，《武士道》的若干章節已翻譯成匈牙利語和俄語，提供給該國讀者。在日語方面，已經刊印了幾乎可以說是註解本的詳細介紹²，此外，為了學習英語的學生，已由我的朋友櫻井先生編寫了詳細的學術註解。我還要感謝他在其他方面的幫助。

想到我的拙作在各地的廣泛範圍都獲得讀者喜愛，令

-
- 1 倫貝格 (Lemberg)，即今烏克蘭的利沃夫。——譯者
 - 2 這裏所說的介紹文章是指在《日本》報上連載的飽翁道人寫的《武士道評論》。該評論加上詳註，作為裳華房編《英文武士道評註》(明治三十五年)，以單行本形式出版。又，櫻井先生的詳細註釋，最初刊載於其《英語學習新報》上。——日譯者





我十分滿足。這表明本書所闡述的問題是世界普遍感興趣的事。使我感到無上榮幸的是，從官方消息來源獲悉，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本人曾親自閱讀本書，還分發給了他的朋友們。

在修訂這一版時，我主要只增加了一些具體例子。我遺憾未能加入“孝”這一章，使日本道德之車缺少了一個輪子，只餘下另一個輪子——“忠”。我之所以難以寫出“孝”這一章，並不是由於不知道我國國民本身對“孝”的態度，而是由於我不知道西方人對這個美德的感情，所以無法進行使自己感到滿意的比較。我想將來能對這個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加以補充。當然，本書所涉及的所有問題，都大有進一步加以應用和討論的餘地。不過，要使本書比目前的篇幅更長一些是有困難的。

我大大感謝要妻子辛勞地閱讀原稿，提出有益的建議，特別是她不斷的鼓勵。如果忽略了這一點的話，這篇序言就顯得不完全，而且是不公平了。

新渡戶稻造

1905年1月10日於東京小石川





站在那條
翻越這山峰小路上的人，
會懷疑這是不是一條路？
然而如果從荒野處來眺望，
從山麓到山頂它的路線分明，
毫無疑義！從綿延不斷的荒野
為甚麼會看到一兩處缺口？
如果要傳入新的哲理，
難道不正是這些缺口鍛煉了人們的眼睛，
教導他甚麼是信仰，終於知道
這是最完美的企圖嗎？

羅伯特·布朗：《布勞格拉姆主教的辯護詞》
(Robert Browning, *Bishop Blougramlo Apology*)

應當說有三個強而有力的精靈，在一個時代到另一個
時代的水面上移動，對於人類的道德感情和精神給予具壓
倒性的刺激。這就是自由、宗教和榮譽的精靈。

哈勒姆：《中世紀的歐洲》
(Hallam,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騎士道本身就是人生的詩。

施勒格爾：《歷史哲學》
(Schlegel, *Philosophy of History*)





緒論

我對於為世界各地的英語讀者寫一些關於新渡戶博士所著《武士道》新版的介紹文章，感到很高興。由於博士允許出版社對與本文無關的事項有某種程度的行動自由，所以出版社就把序文託付給我了。我與作者相識已達十五年以上，而對於本書論述的主題，在某種程度上至少已有四十五年的關係。

這是 1860 年的事情。在費城（我於 1847 年在該處看到佩里艦隊司令（Commodore Perry）的旗艦薩斯克漢那號（*Susquehanna*）的下水典禮），我首次見到了日本人，遇見了從江戶來的使節們。我從這些異國人那裏獲得了強烈的印象，他們所遵循的理想和行為準則就是武士道。後來，在新澤西州新布倫威克市（New Brunswick）的羅格斯學院（Rutgers College），我與從日本來的青年共同生活了三年。我教他們課，又像同年齡的學生似地彼此相處。我們常常談到武士道，我發現這是極其饒有興趣的事物。處於這些未來的縣知事、外交官、艦隊司令、教育家以及銀行家們的生活裏，他們之中有一些長眠在威洛格羅夫墓地（Willow Grove Cemetery）者的臨終表現，都與那遠在日本最馨香的花兒的芬芳一樣，非常甘美。當少年武士



日下部臨死的時候，勸他皈依獻身中最高貴的和希望中最偉大的神靈時，他回答說：“縱使我理解了你們的主耶穌，我也不能只把生命的渣滓獻給祂。”這個回答我是絕對忘記不了的。我們在“舊拉雷坦河 (old Raritan) 堤上”，在運動比賽上，在晚餐的飯桌上，一面比較日美間的事物，一面互作有趣的戲言時，或就道德和理想彼此爭論時，我感到自己完全同意我的友人查爾斯·達德利·沃納 (Charles Dudley Warner) 所說的“傳教士的秘密答辯”。在某程度上，我們之間的道德和禮貌的規矩是不同的。不過，這些不同只不過是點或切線之類的差別，並不是像日食、月食那樣程度的差別。一千年前，他們本國的詩人在越過水池，衣裳碰到帶有露水的花朵，竟把露珠留在他的衣袖上時，寫道：“由於它的芬芳，且不拂去衣袖上的露珠。”事實上，我欣幸自己免於成為井底之蛙。它與墓穴的不同，只不過是更深一些罷了。唯有比較，才是學術和教育的生命，不是嗎？在語言、道德、宗教、禮貌舉止的研究方面，說“僅知其一者，一無所知也”，難道不是真理嗎？

1870年，我作為介紹美國公立學校制度的體系及其精神的教育開拓者，受到日本的招聘。離開首都，來到越前國的福井，看到了眼前正在實行的純粹封建制度，的確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在這個地方，我看到的武士道，並非作為異國的事物，而是在其原產地看到的。茶道、柔





道、切腹、在草蓆上俯伏和在街道上鞠躬行禮、佩刀和交往的禮法、一切恬靜的致意和極其鄭重的談話方式、技藝動作的規矩以及為了保護妻子、僕婢、小兒的俠義行為等等，使我了解武士道在這個城市和藩國中，形成了所有上流階層日常生活中普遍的信條和實踐。它作為一所思想和生活的活生生的學校，使少年男女受到訓練。我親眼看到新渡戶博士作為世襲事物接受下來，深深印在其腦海，並以其所把握、洞察以及廣闊的視野，優雅而強勁的文筆表達出來的東西。日本的封建制度已在其最有力的解說者和最堅信的辯護者的“視野之外消逝了”。對他說來，這是飄逝的芬香，而對於我則是“閃閃發光的樹和花”。

唯其如此，我可以作證，作為一個曾在武士道的母體——封建制度下生活過來，而且在它死亡的時候曾在現場的新渡戶博士的記述，本質上是真實的，並且博士的分析和概括是忠實的。博士揮動他那流暢的筆，把長達千年的日本文學中輝煌燦爛地反映出來的畫一般的色彩重現。武士道是經過一千年的演變而成長起來的。而本書的作者則巧妙地記述了點綴在其同胞中幾百萬名高尚人們所經歷的道路上的精華。

有關批判的研究只是加強了我自己對日本國民身上武士道的力量和價值的感受。要想了解二十世紀的日本人，必須知道它在過去的土壤中扎下的根。現在，不但外





國人，就連現代日本人也看不見它了，但是，善於思索的研究者會在過去的時代所蓄積的精神之中看到今日的結果。日本從遠古的陽光創造的地層中，發掘出它今日致力於戰爭與和平的動力。一切精神上的感受，都還在武士道所涵養的人們中堅強地活着。它的結晶體在杯子中溶化了，但其甘美的香氣依然悅人心曲。用一句話來概括，武士道正是它的解釋者本身遵從信仰上帝者所宣稱的最高法則所說的：“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落在地裏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¹

新渡戶博士是否把武士道理想化了呢？其實我們倒要問，他怎能不把它理想化呢？博士自稱是“被告”。在所有的教義、信條、體系上，隨着理想的發展，例證會改變。經過逐漸的積累，慢慢達到和諧，這就是規律。武士道決沒有到達它最後的頂點。它仍然是生機勃勃的。而當它最終死亡時，是死在美與力之中。當日本正處於“走向世界”（這是我們對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和哈里斯（Townshend Harris）以來各種急劇的影響和事件所加上的稱呼）與封建制度發生衝突的時候，武士道決不是一具塗上了防腐劑的木乃伊，它還有着活生生的靈魂。那是實實在在的人類活力的精神。此時，小國從大國那裏受到祝福。日本遵循自己的高貴先例，在不放棄本國的歷史和

1 《聖經·約翰福音》12:24。——譯者





文明中最美好的東西的同時，採納了世界所提供的最美好的東西，並將它同化了。這樣，日本賜福於亞洲和人類的機會是無與倫比的，而日本出色地抓住了這個機會——“隨着範圍的擴大，而日益增強了”。今天，不僅我們的庭園、藝術、家庭等，“即便是一時的娛樂也好，抑或永久的勝利也好”，都憑來自日本的花卉、繪畫以及其他美麗的事物而豐富起來，並且在自然科學、公共衛生、和平與戰爭的教訓方面，日本雙手滿捧着贈品來訪問我們。

本書著者的論述，不光是作為被告的辯護人，而且作為預言者，以及作為掌握了大量的新、舊事物的賢明持家者，擁有教育我們的力量。在日本，再沒有任何人比作者更善於把固有的武士道教訓及其實踐跟生活與活動、勞動與工作、手藝與寫作技巧、土壤的耕作與靈魂的教養相調和而結合起來了。新渡戶博士作為大日本的過去顯現者，他是新日本的真正建設者。在日本佔領下的台灣，以及在京都，博士既是學者同時又是實踐者，既精通最新的科學又精通最古的學術。

記述武士道的這本小書，不僅是對盎格魯—撒克遜國民的重要信息，而且它對本世紀的最大問題，即解決東方與西方的和諧與一致的問題，作出了顯著的貢獻。古代曾有過許多文明，但在未來更加美好的世界裏，文明可能是一個。所謂東方 (Orient) 和西方 (Occident) 這個詞語，正在跟相互之間的非理智和侮辱的所有積澱一起並成為





過去。作為亞洲的智慧和集體主義與歐美的精力和個人主義之間的有效率的中間人，日本正以不屈不撓的毅力在工作着。

博古通今、具有世界文學素養的新渡戶博士，在這一點上充分顯示他是人得其位，位得其人。博士是真正的執行人和調和人。長期以來忠於主的博士，無需也沒有為自己的態度作辯解。懂得人類的歷史是由聖靈指引的途徑以及作為人類之友的至高無上者指引的學者，他不得不對一切宗教的創始者及其基本經典的教義跟民族的、合理的、教會的添加物之間加以區別，難道不是嗎？著者在其序言中所暗示的、各國國民擁有各自的《舊約》教義，基督的教義並不是為了將它們破壞掉，而是為了把它成就起來。即使在日本，基督教將解脫它的外國形式和裝潢，不再是一種舶來品，而在武士道發展起來的那塊土壤中深深扎根。解開捆綁的繩索，脫去外國的制服，基督教會將同大氣一樣化為這個國家的國風。

威廉·埃利奧特·格里菲斯 (William Elliot Griffis)

1905 年 5 月於伊薩卡







第一章





作為道德體系的武士道

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徵櫻花一樣，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它並不是保存在我們歷史標本集裏一種古代美德的乾枯標本。它現在仍然是我們中間活生生的力與美的對象。它雖然沒有採取任何可觸摸的形態或形狀，但它卻使道德的氛圍芬芳襲人，使我們意識到：我們今天仍然處於它強大的支配之下。衍生並撫育它的社會環境已經消失很久了，但正如那些往昔存在，而現已消逝的遙遠星辰一樣，仍然在我們頭上閃閃發亮。作為封建制度之子，武士道的光輝亦如是，在其生母的制度死亡之後卻仍然存在，繼續照耀着我們的道德之路。在歐洲，當與它不相伯仲的騎士道死後而無人顧及之時，有一位伯克 (Edmund Burke)¹ 在他的棺木旁發表了眾所周知的感人悼辭，我現在能以這位伯克的國語（英語）來闡述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實在由衷的感到愉快。

可惜，由於缺乏有關遠東的知識，以至博學如喬治·米勒博士 (George Miller) 這樣的學者，亦竟毫不躊躇地

1 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英國政治家。——譯者



斷言——騎士道或類似它的制度，無論在古代的各國國民或現代的東方人中，都未曾存在過。²不過，這種無知完全可以原諒。因為這位善良博士的第三版著作，正是在佩里艦隊司令叩打日本鎖國主義大門的同一年發行的。其後經過十餘年，正當我國的封建制度處於奄奄一息的彌留之際，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其所著的《資本論》中，提醒讀者關於研究封建主義社會及政治制度的特別優勢，便是當時唯獨在日本還可以看到封建主義存在形態。我也同樣邀請西方的歷史和倫理研究者來研究現代日本的武士道。

對歐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及騎士道的歷史進行比較探討，是件饒有興味的事，但本書的目的並非詳細地深入研究這些方面。我的嘗試毋寧是要闡明：第一、我國武士道的起源及淵源；第二、它的特性及訓條；第三、它對民眾的影響；第四、它的影響的持續性和永久性。在這幾點中，對第一點僅限於一些簡單而粗略的闡述，否則我就會把讀者引入我國歷史迂迴曲折的小巷裏去了。對第二點將作略為詳細的探討。因為它會使國際倫理學和比較性格學的研究者們，對於我國國民的思想及其行動的方法感到興趣。其餘各點將作為餘論來處理。

2 喬治·米勒：《歷史哲學》（*History Philosophically Illustrated*）（1853年第三版），第2卷，第2頁。——作者



我粗略地譯作 chivalry³ 的這個日本詞，在原義上要比騎士道含蓄得多。武士道在字義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職業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須遵守之道。用一句話來說，即“武士的訓條”，也就是隨着武士階層身份而來的義務。既然明瞭它的詞義，以後請允許我使用這個詞的原詞。使用原詞，從其他理由來說也很方便。這樣截然不同的、產生特殊的思考方法和性格型式，而且是地域性的訓條，應當有其外表特徵。因此，若干個極為明顯地表現民族特性的詞，具有其國民的語言特徵，即使是最幹練的翻譯家也很難把它的真意表達出來，有時甚至很難保證不會積極地加上不妥當、不正確的含義。有誰能夠通過翻譯完美表達出德語“*Gemüt*”的意思？英語的“*gentleman*”和法語的“*gentilhomme*”，在語言上極其接近，但有誰感覺不到這兩個詞所具有的差異呢？

武士道，如上所說，乃是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則的規章。它並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只是一些口傳的、或通過若干著名的武士或學者之筆留傳下來的格言，毋寧說它大多是一部不說、不寫的法典，是一部銘刻在內心深處的律法。唯其不言不文，通過實際行動，才能看到更加強而有力的功效。它既不是某一個人的頭腦（不論其如何多才多藝）創造出來的，更不是基於

3 即騎士道。——譯者

某一個人物的生平（不論其如何顯赫有名）的產物，而是經過數十年、數百年的武士生活的有機發展。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佔有的地位，恐怕和英國憲法在政治史上所佔有的地位一樣。然而，武士道卻不能與大憲章（Magna Carta）或者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相比較。十七世紀初，的確制定過武家諸法度，但是武家〔諸〕法令十三條，大都是關於婚姻、城堡、黨徒等的規定，只不過稍稍涉及訓導的規則而已。因此，我們不能指出一個明確的時間和地點，來說“這裏是其源泉”。不過，由於它是在封建時代而臻於自覺的，所以在時間方面，可以認定它的起源與封建制一樣。不過，封建制本身由許多線條交織而成，所以武士道也承襲了錯綜複雜的性質。正如英國的封建政制可以說發源於諾曼征服時代，所以也可以說日本的封建主義興起於十二世紀末，和源賴朝⁴稱霸是同一個時代。然而，就如在英國，封建制的社會諸要素可上溯到遠在征服者威廉⁵以前的時代一樣；在日本，封建制的萌芽也遠在上述時代以前就已經存在。

同樣，正如在歐洲一樣，當封建制在日本正式開始時，專職的武士階層便自然而然地得勢了。他們被稱

4 公元十二世紀時，源賴朝在日本打敗木曾義仲和平氏，掌握中央政權，建立了鎌倉幕府。——譯者

5 即 William I the Conqueror of England（約 1028-1087）。——譯者



為“侍”(samurai)。其詞義有如古英語的 *cnicht* (knecht, knight, 騎士)，意味着衛士或隨從。其性質亦類似凱撒在“阿奎塔尼亞”⁶中記述的勇士 *soldurii*；或者是塔西陀 (Tacitus) 說的跟隨着日耳曼首領的衛士 *comitati*；或者與更後世相比的話，類似在歐洲中古史上見到的鬥士 *milites medii*。一般還使用漢字的“武家”或“武士”這個詞來形容。他們是特權階級，最初肯定是指那些以戰爭為職業的、稟性粗野的人。在長期不斷的反覆戰鬥中，武士自然而然的是從最勇敢、最富冒險精神者中招募來的，隨着淘汰過程，那些怯懦柔弱之輩都被拋棄。借用愛默生⁷的話來說，就是只有“富有男子氣慨、像野獸一樣有力的、粗野的種族”才得以生存下來，他們便形成了“侍”的家族和階級。等到具有崇高榮譽和巨大特權，以及伴之而來的重大責任時，他們很快就感到有需要建立一個共同行為準則。尤其因為他們經常處於交戰者的地位，而且隸屬於不同氏族，這就更加有其必要了。正如醫生靠職業上的禮法抑制彼此之間的競爭，又如律師在破壞禮節時必須出席質詢會一樣，武士也必須有某些準則使他們的不端行為受到最終審判。

6 阿奎塔尼亞 (Aquitania)，凱撒所記述的阿奎塔尼亞，其地域超過法國西南部歷史上的阿奎坦地區，包括從比利牛斯山脈延伸至加龍河的大片區域。——譯者

7 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國思想家。——譯者



在戰鬥中要堂堂正正！在野蠻人和類似兒童的原始意識中，存在着極其豐富的道德萌芽。這難道不是一切文武之德的根本嗎？我們譏笑（好像我們已經超過了抱有這種願望的年齡似的！）那個英國孩子湯姆·布朗⁸的孩子氣的願望：“但願成為一個名留後世的、既不威嚇小孩子，也不拒絕大孩子的人。”但是，誰不知道這種願望正是那規模宏偉的道德大廈所賴以建立的奠基石呢？難道我說就連最溫和的、而且最熱愛和平的宗教也支持這種願望，是過甚其詞嗎？英國的偉大，多半是建基於湯姆的願望之上的。而且我們馬上便會發現，武士道所屹立的基礎並不比它小。縱使像教友派（Quaker）教徒所證明的那樣，戰爭本身不管是進攻性的或防禦性的，都是野蠻和不正當的，但我們還可以像萊辛（Doris Lessing）一樣地說：“我們知道，缺點不論如何巨大，美德也是從它產生出來

8 托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小說《湯姆·布朗的學生時代》（*Tom Brown's Schooldays*）中的主人公。